

農民工

中國現代化的勞苦大軍

浙江嘉興的春運火車票臨時售票點前，一位老農民工以凍裂的手指展示剛買到的火車票。數億農民工締造了中國的現代化，但城鄉二元戶籍制讓他們只能追求卑微的現代生活……

撰文/趙中麒(經典雜誌撰述)

攝影/黃世澤(經典雜誌資深攝影)

七天的「十一長假」，讓平時即熙來攘往的廣州火車站在假期開始之前就擠進更多人潮。因正值秋收季節，不少來自其他省分農村、在廣州打工的農民工，紛紛趁此機會返回老家，幫忙家裡的農活，「家裡的地還種著玉米，雖然平常有老人幫忙看著，但還是得回去幫忙收成。」來自安徽肅州的小劉哥和另外六位同鄉，坐在車站前的廣場等火車。

距離火車進站還有一段時間，安檢人員不讓他們提前入站，他們只好在廣場上等待。九月底的廣州，秋陽依然炙熱到足以將人蒸發。看著這幾位臉上被皺紋刻畫出生命歲月的大叔在廣場忍受紫外線對皮膚帶來的刺痛，我不禁詢問：「為何不到旁邊的麥當勞吹冷氣？」「不行！社會有九等人，我們農民工就是最下等的那一群，麥當勞太高檔了，我們去不起……」現年六十歲的老馮搖搖頭說。

原來，餐桌可能不如街邊小餐館清潔多少的麥當勞，已經被當成現代化都市格調的餐廳，不屬於「沒文化」的農民工。老馮的話，讓我也跟著搖頭。然而，老馮的自卑，不但不是特例，而且其來有自。

戶口：一堵看不見的牆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為了解決大量農村人口湧入城市所造成的各種經濟與治安問題，中共中央首先於



多數農民工只有春節才有時間返回老

家，故而沿海城市各火車售票點總是擠滿徹夜排隊、只為順利返鄉的購票人潮。(攝影/儲永志)



一九五一年公布施行《城市戶口管理暫行條例》，統一城市戶籍管理制度。一九五三年更下達《勸止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將支持共產黨的農民視為沒有文化的盲流，嚴格限制他們遷徙到城市的權利。

長年戰亂造成田地荒蕪與糧食嚴重不足，是中共建國後的另一個治理窘境。一九五七年，中共通過《農業發展綱要十四條(修正草案)》，以確保農民都能在農村幹活兒，藉以壓榨他們的勞動力，生產全國人民所需要的糧食。一九五八年，北京當局進一步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將戰亂中倖存的人民劃分為「農村」與「非農村」。在

的農民而言，就像一盞可以引領他們從貧困泥沼中爬出的明燈，仍舊吸引著一波又一波的農村人口投入城市各種非農業經濟活動。根據中共國家統計局《2013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截至二〇一三年年底，約有兩億七千萬農民工飄盪在中國大陸各大城市。

今天，不論在上海、北京、廣州、深圳，或是任何一個二線城市，最能象徵市民生活的街邊燒烤小攤與地攤、城市邁向現代文明所需的建築工人與環衛工人、以低薪資此一「中國價格」打造出「世界市場」與「世界工廠」的各類型工廠工人，乃至沙縣小吃、重慶烤魚、蘭州拉麵等小餐廳老闆，各大小旅館服

許多肢障人士在城市裡往往只能開「摩的」(摩托計程車)賺取微薄收入(上圖)；少數民族則常見開設小餐館來追求他們的現代生活(下圖)。



此規定下，農民欲由農村遷居城市，必須持有城市雇用單位的雇用證明、學校錄取證明，以及城市戶口登記機關的遷入許可證等，才能將戶口轉移。由於城市裡的分房、醫療、養老、子女教育等福利與資源是單位所提供，這套制度因而創造出農村與城市「戶」不相屬，甚至在社會福利分配中相互排斥的二元戶口制度，並延續至今。

改革開放後，北京政府放鬆經濟與社會控制，鼓吹「嚴格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小城市，積極發展小城鎮」，鼓勵農民進入農戶集體經營的鄉鎮企業，「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不過，工業化與大城市建設對大量勞動人口的需求，對勞動力飽受壓榨

務員、洗浴養生會館中的正規服務員和「保健服務員」，以及站在黑街暗巷中的性工作者，幾乎都是來自農村的打工者。誠如專研中國戶口制度的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地理系教授陳金永所說：「農民工，已經成為推動中國經濟機器最重要的齒輪。」

只是，「農」與「非農」之間那道高牆，沒有因為農民工進入城市而倒下。以上海為例，要取得上海的戶籍，必須具有科技相關系所的碩士學位且在上海工作滿三年、具有博士學位，或在知名企業擔任經理或其他高階主管至少三年。當農民工多數從事低下階層的工作時，此種做法無異於一個「設下高門檻的技術移民規定，強化了農村人口與城



市人的階級差異」，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政策分析師黃靖洋表示。

這堵高牆也決定了農民工是否能與城市人享有相同的社會福利。來自四川省德陽市中江縣迴龍鎮的老吳，因為沒有廣州戶口，孩子的教育問題曾一度讓他傷透腦筋，「戶口不在這邊，小孩沒辦法念公立小學，除非花錢找關係。雖然政府有一個措施，分配公立學校名額給蘿崗開發區大企業的員工，但必須從小學或中學一年級開始念起，且名額有限，怎樣也輪不到我。所以我把小孩送回內地，由老婆照顧了。」

老吳的煩惱，也是大多數農民工的煩惱。只是，即使孩子在城市讀到初中，

城市的階級差異，讓農民工不得不把孩子送回老家，改變農民工的家庭形態。

社會保險，是另一個凸顯農民工與城市人福利差異的制度。中國大陸的社保繳交分兩部分，一部分是個人繳交，存在自己帳戶，一部分是企業繳交給政府，退休後，由政府撥款給付給個人。我如果回鄉工作，企業繳交的部分不能移轉回鄉，個人繳交的部分雖然可以移轉，但回到老家後，若老家沒有跟城市系統連線，民工們就可能領不到錢。

農民工如果沒打算紮根於城市，就無法領回企業繳交的部分，加上薪水低，許多人寧願可手上多拿點現錢，也不參加社保。因為企業幫外來務工人員繳交

在廣州，農民工拉車載貨一天僅能賺得一百多元人民幣(上圖)；工廠裡薪水雖高一些，但制式化的生產線工作卻將人變成機器(下圖)。



仍會面臨是否要將孩子送回老家、自己獨留城市工作的關卡。雖然中央政府出台開放外來務工子弟「異地中考」的政策，但這項政策並沒有被真正落在每一個城市。

廣州與深圳市政府允許民工子弟在當地參加中考的門檻，是必須具有合法穩定職業、合法穩定住所並連續持有有效《居住證》均滿三年。老吳在當地一間台資工廠工作超過十年，符合門檻。但就像廣東省發改委張軍接受本地媒體採訪時所言，進城務工人員一般從事低技術、低工資的職業，「這些特點決定了他們難以有持續的工作和穩定住所。」這種門檻，等於找個理由正當化對民工子弟受教權的限制，也等於承認農村與

的費用比例高於本地人，「許多小公司抓到農民工這種心態，乾脆不幫他們購買保險。」深圳市春風勞動爭議服務部主任張志儒指出，「尤其是環衛工人、建築工人，雇主不買社保的情形最嚴重。」也因此，春風勞動爭議服務部長年協助深圳市農民工跟企業集體協商，爭取替每一位勞工購買社保，讓農民工退休後能「老有所養」。

與個人健康息息相關的醫療保險給付，也因為這堵高牆而有所差別。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祁冬濤表示：「以前在老家參加農民的醫保，到城市工作，萬一生病，在城市看病的發票沒辦法拿回老家報銷。最近幾年推動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後，這種

為了省下租屋費用，從事補漏行業的農民工家庭索性在工作車上吃、住、生活，他們被稱為「新吉普賽人」。(攝影/儲永志)





農民工習於拉老鄉一起外出打工，並同住在廉價群租房。雖然居住環境不佳，也沒有私人空間，但同鄉彼此照顧，成為生活中相互扶持的力量。

情形沒有了。但卻出現新問題，我在老家參加新農保，接著到城市打工，在城市看病的發票，在城市可能只能報銷三成，我得回老家在當地的醫院看病，才可能報銷到七成。」黃靖洋補充，「有些城市民營醫院開的發票是企業發票，帶這個發票回去報銷，老家那邊則可能不認帳。」凡此，均可能影響農民工在城市看病的意願，變相壓抑農民工的就醫權。

農民糊口，難如登天

改革開放後，三十多年的人口流動，大多數的農村已經空洞化到「不成村形」；農村的家庭形態都因嚴重的留守老人、留守兒童、留守婦女等「三留」

問題而改變。江西省吉安市吉水縣醴橋鄉下家頭村，是典型的例子。

青原色是一間在江西省吉安市推動關懷農村空巢老人計畫的非政府組織。在他們的安排下，我跟攝影同仁得以親訪下家頭村。除了第一天在村口理髮廳遇到的理髮廳老闆和他同學是五十歲的中年人，在下家頭村居住期間，映入眼簾的，不是坐在街邊矮牆上與親朋閒聊的老人，就是小學生。在農田中割稻、馬路上曬穀的農民，也全是老人，就連村內正在進行的自來水管工程，手拿鏟子鏟碎石泥塊的人，也都是村子裡老先生與老太太。「現在是假期，還可以看到小孩子，如果不是假期，就更空了。」在縣城教書的鄒老師這樣說。



來自湖南的清潔工老李，跟兒子一起在廣州租屋。因為城市發展看俏，房東臨時漲房租、要求搬離，成為老李必須不時面對的生活困境。

之所以如此，除了城市發展的拉力，吸引農村人口往都市掙錢，土地集體制僵固的運作，造成農業產能不足以應付人口增長，以致農村生活普遍困難，則是讓大批農民飄蕩在都市的推力。

一九七八年，北京政府實施「包產到戶」策略，讓土地所有權歸屬於村民組成的村集體，個別農戶則擁有十五年的耕地使用權；一九九八年，延長土地使用權到三十年；二〇〇三年，頒布《農村土地承包法》，禁止農村集體在三十年合同期間內，改變農戶承包農地的大小。這些農地改革，萬變歸宗，都是禁止土地買賣，以免農民賴以為生的農地落入吃人不吐骨頭的土豪、劣紳與資本家手中。

不過，隨著人口增長，土地並沒有增加。在農村，一個三代家庭，經常動輒超過十人，在土地大小「三十年不變」的原則下，每一戶人家的土地所種出來的農作，往往僅夠餬口。鄒金根一家，扣除在外打工的親人，家裡還有七口人，但他們分到的土地只有八分。「八分地，最多只能種出六百多斤的糧。以前做農活，吃得多，一餐吃三大碗，差不多兩斤，一天就吃掉六斤，六百斤的糧能吃多久？能賣多少？最多，就是賣一點換肥料。想吃點其他的菜啊、肉啊，就要找其他的活兒才行。」因此，下家頭村的鄒金根學了木工，農閒時接點整修工作，直到二〇〇八年去他堂弟在廣州開的拉鍊工廠幫他打工為止。



在廣州打拚多年的劉姐和先生，住在單位提供的宿舍，雖然生活便捷，但近乎全年無休，讓兩人不時想著何時才能存夠錢，返回老家。

在北京清華大學東門「足道」按摩中心工作的芳芳來自東北，「我們那邊的農村在年初播種時，都得跟銀行貸款才有錢買肥料、買種子。等收成了，大部分都拿去還貸款了，剩下的還不夠自己吃。我們就這樣一年一年過，除了外出打工，還能怎麼辦？」

只是，農民工的薪資，通常僅能在城市維持基本生活。二〇〇八年，北京當局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規定各城市的薪資必須設定最低工資。廣州、深圳與北京等地街頭隨處可看到招聘布告，布告中，餐廳或旅館服務員等低技術工作的月薪平均為兩千五到三千五，似乎農民工的薪水已大

幅提升。但是，在城市消費不斷上漲情形下，最低工資也僅能讓農民工勉力生存，而看起來上漲的薪水，「其實是最低工資加上津貼、加班費後的綜合工資，你還是要靠加班才能賺到錢。」

芳芳每天工作超過十二小時，從沒有放假。「我不放假的，賺錢比較重要。」甚至，有些老闆不顧法律規範，假藉名目苛扣工資，在華南理工大學當清潔工的劉姐二〇〇八年到廣州一間服裝工廠打工時，「每天工作十二小時，而且，還不是所有的錢都能拿到手，每個月要扣生活費一百五十元，做滿一年，才能拿回這筆被扣的錢，如果中途走掉，就拿不回來了。」劉姐的老公來



在中國，賺錢已成為普遍的信仰價值，做小生意是許多人能想到的致富捷徑，因此連私家車後車廂也可以成為創業店面。

自河南省荷澤縣，二〇〇八年到廣州從事保安工作，每年省吃儉用可以存下兩萬元，但這項「成就」卻是用「包括過年，五年來從沒有休過假」所換來。

掙錢，是掙「現代」生活

我們在廣州火車站遇到的小劉哥，是修鐵路的工人，「當初講好，一天一百三十元，每個月三千九百元，一年領三次，但老闆經常找理由延遲發工資。前陣子，我爸生病，要跟他領我的工資一萬元，拖了半天，只給個四千多元。」難掩氣憤與不平的小劉哥愈講愈大聲，「這次沒完全結清，就說下個月給你，下個月又拖拖拉拉。如果不幹

了，就拿不回老闆欠你的錢，這就像一根繩子，把我們全部綁在一起了！」

廣州市登峰村是開發較早、商業活動較發達的城中村。除了本地人與農民工因為交往、求生所交織形成的各種正規與非正規經濟活動，還有許多非洲人從事衣服的批發買賣，商貿城外廣場甚至可見十幾位炒黑市外匯的人。在商貿城旁邊的馬路，幾位拉板車的大姐正在等著客人喊她們去拉貨。趙中梅大姐曬了一整天太陽，只賺了幾十元。我們遇到趙大姐的時間，已是傍晚，她旁邊另一位大姐一天下來更只進帳十五元。

城市生活如此辛苦，為何仍堅持在大都市中游移與飄蕩？趙大姐無奈地



表示：「我們在老家種田也一樣苦啊！只要想開了，就好了。」想開了，固然可以說明部分原因，但農村與城市發展落差所引發對「現代生活」的想像與追求，或許才是他們堅持的原因。

老吳在四川老家念書時，經常聽到

「東南西北中、發財在廣東」這句話。畢業後他在老家一間國營企業工作，當時看到有人從廣州或東莞回去，「言談舉止、穿著還是各方面都不一樣了，覺得這個人好像混得不錯，不甘心自己在國營企業這樣過完這一生，就出來闖

了。」來自海南島，和老吳在同一間台資工廠工作的老邢更直接，「我有想過，來這邊賺了錢，要買房、買車，跟別人一樣過高大上(高端、大氣、上檔次)的生活。」只是，有限的工資雖然能改善他們的生活，買車買房的高大上生

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夢」，是繼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之後，再次驅動上億農民工投入現代建設大軍的重要口號。

活，仍沒有辦法實現。

如果老家來自遙遠大山的少數民族村落，這種對現代生活的期待不僅更明顯，還會衍生對漢文化的崇拜。現年二十六歲的小雪是深圳市一間洗浴養生會館的按摩師。來自廣西壯族自治區環江縣的她，十六歲到深圳打工時還不太會說漢語，她的漢語是在成衣廠工作時，每天聽別人講話才慢慢學會。「我很喜歡深圳的，老家那裡不像這邊生活那樣方便，要什麼就有什麼。我現在每次回去，他們看電視時，都會叫我去幫忙翻譯，告訴他們這是什麼什麼……我在大城市工作，還會說漢語，他們羨慕死了。」

對其他年輕的農民工來說，或許沒有追求高大上的雄心壯志，但他們透過其他方式享受他們所理解的現代城市生活。新浪網攝影記者鄒璧宇以自己的發現指出：「在東莞，很多年輕人染著五顏六色的頭髮、剪著讓你一眼就記住的髮型，好像是他們融入城市生活的方式。」十月一日中共國慶節，深圳石岩鎮國惠廣場擠進大批逛街人潮。許多年輕女性農民工穿著看起來很像小禮服的衣服逛街。從她們臉龐的笑容中，似乎這樣的服裝，充分滿足了她們對城市生活的想像。

農民工們拚命掙錢所追求的現代生活，不一定非得在城市才能實現，他們



隨著打工父母住在城市的隨遷兒童，因戶籍在農村而難以進入當地公立小學，他們的教

育問題是農民工心中永遠的糾結。

會把這種期待，投注到老家的建設與下一代身上。就像北京大學社會系教授盧暉臨所說：「打工是一種工具，是為了回家蓋房子、結婚、養育子女。」「我們村子每一個出去打工的人，都會想辦法回來蓋一棟漂亮的房子，現在幾乎每個農村都是這樣子，村子裡到處可以看到美輪美奐的新房。」來自廣東省和平縣寨下村的葉祖藝這樣說。住在下家頭村時，我就發現，該村約有一半的房子是新修建的。

留下？還是回家？

農民工普遍相信，自己就是因為沒有文化，才只能辛苦地打工。因此，「一定要讓孩子好好學習、有文化」，才能擺脫苦日子。問及小劉哥對孩子的期待時，他一面看著手機中的孩子照片，一面說：「我要我的小孩念大學、讀博士、當教授。」趙中梅大姐四個孩子都念私立學校，每學期的學費加起來要一萬元，為了孩子當個穿著體面的上班族，她寧願砸鍋賣地拚命幹活兒，也要把孩子培養成有文化的人。

只是，更多打散工的人、街頭開「摩托三輪車」的肢體傷殘大哥、拉板車載貨的大嬸，以及在黑街暗巷中，賺取服務底層男性每次四十五元「保健費」，並生活在愛滋病高風險威脅的大姐與小妹，只能與老鄉或朋友在環境髒亂、治安欠佳的城中村合租一個不到四坪的房間，或在城市大樓地下二層甚至三層所隔出來的房間，倚著自己的那張床，玩著手上那一支廉價的智慧型手機，默默地過著他們想像中的「現代生活」。

對小雪這樣的年輕農民工來說，城市生活雖然消費高，相比老家每月最多只能賺幾百元，她寧願繼續在都市載浮載沉，「回去有什麼好的？這邊這麼方便，我再窮也要在深圳租個房子待下去。」但對年紀四十歲以上的中、老年農民工來說，多數人只是把都市打工當成一種賺錢的過渡階段。中共中央所推動的新農村建設，不斷提高對農村基礎建設經費的補助額度、小縣城的都市更新與招商引資，讓許多原本看來了無生趣的小城市出現更多機會、加上希望未來能讓百分之七十的農村人口轉為城市戶口的城鎮化工程，更讓他們覺得不一定非得在大城市終老，特別是小孩長大之後。

劉姐的心境，可為這種想法的代表。「前陣子，看到一位在這邊住了十七年的湖南人在等車，準備回老家。他們倆的公婆都走了，小孩也大了，沒有什麼牽掛了。」劉姐強紅著眼眶繼續道來：「我就跟他們說：『哎呀！你們能回家真好。』後來，我就跟女兒講：『等妳畢業了，我就要回老家，在家做飯給妳吃，不打工了。』」

當然，也有農民工不願意留在城市，是因為他們在城市中找不到歸屬感。葉祖藝回想自己有一次跟大姐聊天時，「她曾說過，有一天要回家自己做個小生意。因為，在城市，心是空的，永遠覺得自己不屬於城市。」鄒金根的大女兒和女婿原本也在廣州打工，生了孩子後，為了避免因為工作而把孩子送回老家，造成親子分離，雙雙決定離開廣州，回到江西吉安市吉水縣工作。「薪



勞動力大規模輸出到城市，農村因此

「空巢化」，造成嚴重的留守老人、留守婦女與留守兒童等「三留」問題。



因補償過低、居民抗議而輒然中止的拆遷開發，在廣州並不罕見。破敗的城市一隅，往

往也成為農民工的棲身角落。

水雖然少，但消費也低，我們照顧孩子方便。而且，我們又沒有文化，不可能留在都市的。」

戶口制度的高牆，不僅製造出瑟縮在城市角落的卑微農民工，也讓打工成為一項魔咒，造就第二代農民工，使得「農民工」近乎成為被制度化的世襲階層。根據中共國家衛計委發布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3》就指出，目前中國大陸超過一半的勞動年齡流動人口是「八零後」的年輕人。或許終於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根據《新京報》報導，二〇一四年七月三十日，中共國務院公布《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決定取消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的區分，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

十一長假結束後，在北京地鐵中，看到已進入老年的農民工扛著麻袋、提著麻繩網綁的家當、穿著「典型農民工品味」的破舊衣服，繼續著他們在都市中的游移與飄蕩生活。他們臉上的皺紋、緩慢的步履、已經不再能挺直的腰桿，訴說著他們過去三十多年對中國現代化的付出。

當他們可能因為種種原因仍舊必須以自己的勞動力投入未來中國夢的建設行列時，我發現，地鐵中的乘客懂得讓位給衣著得體、看起來像是都市人的老人家，卻沒有人讓座給老農民工。農民工子弟就讀都市中的公立小學，引發都市學生家長不滿，將子女轉學的新聞，則仍不時可見諸當地媒體。

改變制度容易，但是，社會中那道無形的高牆呢？

